國家發展研究　第八卷第二期
2009 年 6 月　　頁 1-54

中國政治思想研究在臺灣（一九四五至二〇〇八）：孫廣德先生作為第三代的一個範式

朱浤源*

收稿日期：2008 年 10 月 13 日　　接受日期：2008 年 11 月 14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摘　要

「包含兩岸在內的大中華世界，其三、四千年以來政治思想的特色爲何？」臺灣曾有許多學者，在光復以後六十多年來做過無數的探討。本文將成千上萬學者，依時序分爲四個世代，並挑出代表該世代之數十位，以本文的一半篇幅加以簡介，俾建構各自的特色。

再以另一半篇幅，挑選足以代表光復這六十多年的一位學者：孫廣德，作爲範式，以深度分析這一甲子當中，臺灣在此領域的主要貢獻。作者在本文，以政治學關於「統治」的幾組變項，系統證明專研中國政治思想史至今已一甲子以上的孫教授，其研究與創作，足以作爲臺灣地區研究此一領域的代表；而他對中國政治思想從封建，經君主，到民主變遷的觀察，也有許多超越前人的發現與論述。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處在大革命之下的中國，特別是西化與基督教化最深的臺灣，人民似乎不再奉行從封建時代開始，流行至少三千年的「民本」思想，而改採「民主」。但是，縱看中國歷代文獻與史乘十餘次、橫剖各代人物數十回的孫教授，卻有不同的看法。

在其所評介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兩三千年的的大傳統裡，吾人見到對「民本」的一再強調，卻見不到中國歷代以來的菁英肯定民主政治。因此，他雖然介紹近現代民主，並肯定民主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存在與必然，但也客觀地告訴世人：中國在秦以前，並無皇帝專制，而且思想自由；於秦至清代的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中，強調皇權統治需以民爲本；他更在民國八十一年發乎讜論，提醒學者們：「民主」也只是「政治神話（political myth）」的一種。

關鍵詞：孫廣德教授、中國政治思想史、民本、民主、西方基督教、神話、臺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言

一、緣起

臺灣自古即爲開放島[1]，到了大航海時代，更進入世界各地主流文化爭先登陸的階段。到二十世紀，它的文化底蘊，不祇多元，而且開始深度化與結構化。由於它的面積不大，化成的脈動自然較高，自從一八六五年基督教長老會登陸以來，已成功地傳輸其民主、自治等理念，進入社會精英階層，因此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至今，在政治劇變之中，人們思想的變革，也到達前所未見之快速的程度。

但是，想把臺灣地區「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情況做一番回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大陸緊鄰臺灣，大陸移民四百年來繼踵不絕。剛好進入亙古未有之大革命時代的中國[2]，政治思想對臺灣人民的影響，既深且廣。也因此，這是一個十分熱門的領域，而臺灣在近六十年以來，由於背景特殊、情況複雜以及社會脈動強勁，故而截至目前爲止，在這個領域裏面找題目下工夫的人，可以用「成千上萬」來形容。沒有人能夠把他們的名字找齊，更沒有人能完全蒐盡他們的所有相關作品。

但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工作，如果真的能夠將他們的心底最基本想法找到，不但可對中國政治思想有深切的了解，而且更能深入其思想架構裏層，做某種程度的分類，把作者們的預存傾向（predisposition）

---

1 朱浤源，〈華人、中國人、台灣人〉，朱浤源主編，《一國良制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科際整合研究會，民 88.6，頁 39-89。

2 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Haven: Harper & Row, 19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彰顯開來。這種工作，在二十世紀這個重視意識形態，以致革命蜂起，變遷快速的時代，是很有意義的。

可是，由於資料龐雜、分散，這是一件極不可能做得完整的工作。尤其是過去的六十多年裏，多種意識形態與重大政策在島上糾纏爭艷，甚至互鬥與相互取代，使得上述的預存傾向，又受到時局的牽制。造成研究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不止要做內容分析，更須顧及階段性思潮與政局的重大更革。

二、方法與結構

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這個劇變而多元，同時充滿情緒的時代裏，想把自己超然地從多色調的眼光中掙開，以無色處理有色，進而去蕪存菁，攫住精要之點，既見林又見樹，真是困難極了。因此，本文祇針對六十年以來思潮之中，具有代表性學者的著作之流變，大別爲四個世代的四階段先行介紹。將各個世代領導性學者之著作，就基本概念紬繹整理，並簡介於第一、二、三、及八節之中。其中，特別在第三節，以較多的篇幅介紹我國在臺第三個代的學者。這個世代已經相對地自由化，並且也具備中西兼顧的相對厚度，故能倒轉時光，專論遭逢「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雖然仍舊受到若干意識形態所束縛[3]。

---

3 大陸則不然，毛共統治下的學術界，一直深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籠罩。即使到了文革結束，經鄧小平務實開放以後 20 年，仍然受到中共史觀的羈絆。在這個階段所培育的大陸學者，由於深受文革洗禮，其相關論述，仍舊充滿中共史觀。例如**邵德門**從鴉片戰爭說起，以「階級」爲核心觀念，認定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就是「資產階級」學者（或人士）的思想史。自鴉片戰爭開始，先介紹「地主階級改良派」**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第二章）；再言及「農民」**洪秀全、洪仁玕**的革命思想；並及於曾國藩，而爲「封建階級反動的代表」（第三章）；接著是「洋務派」（**張之洞**）與「早期改良派」的**馬建忠、王韜、鄭觀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接著挑出第三代學者孫廣德，以代表這六十年主流。再深入孫教授的堂奧：以四個節（第四、五、六、七）進入其中，做系統性微觀：第四節針對孫教授各部專著的主要切入點（approach），既做三千年縱向的貫串，也做橫面的剖析。並以先秦和近代兩個時段爲例，找出主流概念，予以整理。由於政治學講究統治（governing）或治理（governance），均有發動者與接受者，而且其互動是一系列有條件、有方向的動作，還有憑以配合的整套內外在環境。因此，第五節以統治的 subject 與 object 爲題，觀察孫教授如何處理這些思想家心中，統治的「主體」與「客體」，以勾勒出孫教授研究統治主張的主要發現。第六節析論他所整理的制度、組織、方法與手段的內容。第七節論統治制度、組織、方法與手段，作爲細膩品味另一思想側面的憑藉。

最後第八節，再簡介孫門所培養的第四代學者，作爲本文的結束。

壹、光復初期的第一代學者之著作

一、臺灣本土學者

二十世紀以前的臺灣，其士人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必然始自十七世紀末，但系統撰成專書者，較爲少見。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情況才有兩段轉變。首先是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初期與中期，臺灣人不畏日人強壓，繼續在各地私塾教授與研析四書、五經者，屈指難數。其次，臺人既接受基督宗教，也接受外來新思潮。明治四十四（1911）年梁

陳虬、陳熾、薛福成、姚瑩、容閎等（第四章）；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舉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嚴復 4 人）從高漲到破產（第五章）；資產階級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思想論爭（第六章）；孫中山（第七章）、黃興（第八章）、章太炎（第九章）的政治思想；辛亥革命後中外反動派所掀起的復古逆流（第十章）；最後則介紹陳獨秀、魯迅、李大釗等人的思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啓超訪問臺灣，與此前後，孫中山更三次來到臺灣。二人更激發臺人陳逢源、林獻堂、羅福星、連雅堂、甘得中、蔣渭水等，分頭以演講與撰文等言論，和組織議會請願與組黨等行動[4]，帶領當年知識精英，進入深入研討中國傳統及現代革命思想之中。但是，時人對中國政治思想的接觸與體會，基本上僅在較爲初步的階段。

與此同時的，是中華民國的建立。一九一〇年代的臺人，受到孫中山十一次流血共和革命的激發，武裝起義事件蜂起全島。也受到時代思潮衝擊。之後的一九二〇年代，《台灣青年》、《台灣民報》、《臺南新報》、《台灣日日新報》、《台灣大眾時報》、《台灣》、以及《新台灣大眾時報》等刊物，表現出臺人摸索議會政治、地方自治、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的熱誠。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在中共黨代表彭榮的建議下，招開「台灣共產黨主義者積極分子大會」。這不就說明了中共對台共的援助。而大會成員計：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謝玉葉、林日高、陳來妄、潘欽信。另還有上海讀書會的張茂良、劉守鴻、楊金泉。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中共代表選定上海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金神父照相館」樓上，正式舉行台灣共產黨建黨大會。但是，臺人精英中的主要部分，亦多具建構中國政治思想內涵的熱忱，以及對三民主義的憧憬。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及四〇年代上半的戰爭時期，「皇民化」壓倒一切，臺人被迫支援日軍侵華。上述思想活動，或轉入福建，或化爲地下，並且在分裂之後，部分開始左傾。至於有關中國政治思想的學術探討，則幾乎完全中斷。除了少數人得天獨厚，如黃朝琴、謝東閔、連震東等有幸來往兩岸者之外，留學歐、美、日等國者，人數較眾，至少有廖文奎兄弟、林獻堂、林茂生、陳澄波等[5]，極具影響力。

4　台灣民眾黨的組成，與三民主義的實踐關係密切。

5　廖文奎等人是個例外，參見廖氏民國 25 年在南京大承出版社，所出版《人生哲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們的政治思想，又多受西方基督宗教的指引。孫中山如此，蔣中正亦復如此[6]。基督宗教影響力無遠弗屆，由此可見。而教會內清教徒所建立的自治和代議型政治體制，又隨勢東漸，浸及全亞，包含中、日兩國。其中日本先開風氣，至十九世紀下半頁，已領先中國甚多。故而雖然私下仍不離英、美等國的助力，仍能於一八九四年，以自身之力，在極短時間之內，擊敗中國，取走臺灣、朝鮮。嗣一九〇四年擊敗帝俄，日本已然世界首強，故而再經三十三年準備，於一九三七年，眼看留學其私立振武學校的畢業生蔣中正（原名「志清」）竟能領袖中華民國，乃發動侵華戰爭，企圖三個月內滅掉這個曾經兩千多年帝制，當時科技文明十分落後的文化大國。

二、親自來臺學者

臺灣光復之後，甫遭日軍摧殘八年的中華民國，本身仍極衰弱。治臺的陳儀長官，係留學日本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的高材生，並曾赴德訪問研究與考察。故於奉命治臺之際，邀請大批留日與留德，以及留學歐美歸國之新秀同來。由於文化之陶冶最難，陳儀乃將其中佼佼者范壽康請到臺灣，擔任教育廳長。

范壽康專攻哲學，而且會通中西[7]。所著《中國哲學史通論》[8] 與

學之研究》。（臺北市：大承出版社，民 35.12，初版，頁 176。）

6 吳經雄熊譯、蔣中正（民 32～34 年逐節校讀三遍），《聖詠譯義初稿》，上海：商務，民 32。

7 范壽康兼治中西哲學，他代表性的著作如下：《藝術之本質》（民 17）、《教育哲學大綱》（民 22）、《康德》（民 22）、《亞理士多德》（民 23）、《個性教育》（民 24）、《各科教學法》（民 24）、《中國哲學史通論》（民 25）、《盧梭》（民 36）、《中國哲學史綱要》（民 53）、《朱子及其哲學》（民 53）。

8 范壽康，《中國哲學史通論》，上海：開明書局，民 26，初版；民 35，三版。范氏以秦至清的 2,132 年爲「商品經濟」時代，頗有創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哲學史綱要》[9]，後者抓住由天人合一透過陰與陽之易通，進而以《周書》〈洪範〉爲典範，導出九疇[10]，而爲中國政治思想的核心主脈。此時的中國政治思想研究，充滿中華民國肇建初期的開放與自由氣息。而范壽康足爲表率，故即以范氏爲中心，形成臺灣地區，蒐集相關資料，並展開初步研究的第一代。

學貫中西的范氏一九三〇年代的著作，亦作爲導引戰後臺人研習中國政治思想的最佳材料。但因屬建國初期，帝國主義侵略日亟，國人深有感悟，仇日情緒自然滋長。當年基於抗敵的必要，中國內外所出版三民主義叢書，亦大量發行。身爲國內最好的哲學家之一的范教授，當時所肩負的，是最吃重也是最不討喜的工作：要教育臺灣人民，於最短時間之內，去除日本文化，熟悉中華文化。故將抗敵所出版三民主義叢書大量介紹至臺[11]，使在臺第一代的中國政治思想研究，既帶有高度的共和革命理想，也夾雜若干反日反帝的情緒。

這股情緒，既濃且熾，一旦進入臺灣，立即與曾被迫皇民化十餘年的臺灣精英，互相衝撞。

曾經飽受日本侵華戰爭蹂躪，直覺地充滿中國式民族主義的陳儀、范壽康、許壽裳等大陸來臺精英，不會因爲來到當年日本帝國殖民地的臺灣，就「彈性」地忘記仇恨。至於「昨天」是殖民地、「現在」剛剛不是的臺灣，其人民昨爲日本人，今係中國人；「昨天」當日本兵打中國，被教育看衰中國「奴」，今天自己竟然也是「中國奴」！對來臺的大陸官員與軍隊（及其眷屬）而言：臺灣這裡則是充滿所謂的「漢奸」的社會；對在地的臺灣人，尤其是精英而言，大陸人就是

9　范壽康，《中國哲學史綱要》，臺北：臺灣開明書局，民 53，初版。

10　「九疇」依次是：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以及五福六極。參見：范壽康，《中國哲學史綱要》，頁 12-13。

11　當時長官公署即編印《國父遺教輯要》。另有陳安仁、周世輔、姜琦、楊幼炯、葉青、馬璧、徐熙、張鐵君等，均有專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明落後」的「清國奴」。

相互間濃烈的文化偏見，本已形成矛盾，再加上突然從敵人變成同胞，在公共政策的施行上，未曾細膩調整。因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中民生主義的國有化政策，臺人多有財產被莫名充公者；加上實行民權主義，省參議員積極質詢、以激烈言語問政；無獨有偶，此時美國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Kerr）等情報員鼓動臺獨勢力與中共大批黨員地下運作，在媒體上極力挑撥離間，兩股力量交叉聲援，其勢雄渾難擋。因此，一旦這些國內的不滿情緒由外國介入挑撥、中共地下煽火，全部集中在臺籍精英身上（其中多數深具基督長老教會的背景），透過省、縣市參議院以當場質詢與報章上批判等方式向行政系統「挑戰」，就立即產生劇烈的蹤撞[12]。

三、著作先人而到的學者

際此在臺兩股精英，分別以本土及大陸爲立場，其認知與情緒高度衝撞的時節。由於臺灣已經「光復」，中國政府接收臺灣的同時，有義務重新引進中國文化與思想，遂開始挑選包含中國政治思想在內的作品，購買教科書的經費高達六百萬[13]。陳儀政府及其繼任者，在三年左右的時間之內，大量購入大陸一、兩萬本，包含楊家駱[14]、謝无量[15]、蔣維喬[16]、胡適[17]、趙紀彬[18]、金公亮[19]，錢穆[20]、陳安仁[21]、

12 二二八事件就在文化調適不良的情況下產生。但即使如此，上述 20 位以上學者的著作，依然在學界流行。其中若干人，又因來臺，以及繼續創作，也成爲第二代的成員。

13 《民報》，民 35 年 5 月 8 日二版。

14 楊家駱，《中國思想名著》，臺北：世界書局，民 48，12 冊。

15 謝无量，《中國哲學史》，上海：中華書局，民 29；臺北市：台灣中華書局，民 56，臺 1 版。

16 蔣維喬、楊大膺合編，《中國哲學史綱要》，上海：中華書局，民 24，3 冊、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胡耐安[22]、俞樾[23]、王蘧常[24]、蔣伯潛[25]、賀麟[26]、易君左[27] 等人的相關作品[28]。

維喬編，《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上海：中華書局，民 21，頁 164；民 25，3 版，頁 164；臺北市：台灣中華書局，民 61，臺 2 版，頁 164。

17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28，3 冊、《中國哲學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36，2 冊。

18 趙紀彬，《中國哲思想》，上海：中華書局，民 37，219 頁；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民 48；上海：上海書店，1990，臺 1 版，頁 219。

19 金公亮，《中國哲學史》，出版地不詳：正中書局，民 29，初版，頁 174；不詳：正中書局，民 36，滬 6 版，頁 174；臺北市：正中書局，民 41，臺 1 版，頁 174。

2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37，2 冊，排印本三版。

21 陳安仁，《中國先哲之倫理思想》，廣東坪石：國立中山大學訓導處，民 33，初版，頁 174。

22 胡耐安，《先秦諸子學說》，北新書局，民 23，頁 151。

23 俞樾，《諸子平議》，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24，再版，頁 709。

24 王蘧常，《諸子學派要詮》，北京：中華書局，民 25，頁 316。上海：上海書店，1987，重印版，頁 316。

25 蔣伯潛，《諸子與理學》，商務印書館，民 36，頁 246；臺北市：世界書局，民 45，初版，244 頁；民 66，三版，頁 244；《諸子學纂要》，臺北市：正中書局，民 26；民 42，臺初版，頁 269。

26 賀麟，《儒家思想新論》，出版地不詳：正中書局印行，民 37，初版，頁 119；《當代中國哲學》，南京：勝利，民 33、民 34；重慶：勝利出版公司，民 36；臺北市：宗青圖書公司，民 67，初版，頁 155；《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

27 易君左，《我們的思想家》，上海：正中書局，民 36。

28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印，《館藏中文圖書目錄》，民 71.6，參見館長劉昌博之「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貳、第二代學者所治中國政治思想史

四年之內的國共血鬥，使大陸即將易幟，大批支持中華民國以及中國國民黨統治的黨、政、軍湧入臺灣。俟中華民國政府移至臺北，抗戰以前及抗戰時期極富研究心得的第二代學者進入臺灣。如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29]，以及曾繁康[30]、薩孟武[31]、張金鑑[32]、陶希聖[33] 等的相關著作，多已繼踵范氏而至，但更豐富，使臺灣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光復以後大約四十年的時間，均爲此一富有「戰爭中國」氣息的漢民族情感所充塞，並在反共的前提下，開出新而燦爛的藍色花朵。而臺灣本土的長老基督教徒之勢力，乃被整個壓制，其領導人被迫東移美國與日本。

---

29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 43；臺北市：華岡出版有限公司，民 60、66；台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中華大典編印會，民 57；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民 69、71、82；臺北市；聯經出版社，民 71，初版，2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北京市：新星出版社，2005，第 1 版，頁 640。

30 曾繁康，《中國政治制度史》，臺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 42，初版，頁 279；民 44，再版，頁 277；台北：大中國圖書，民 48，初版，頁 416；臺北市：華岡出版公司，民 65，再版，頁 279；民 68，新 1 版，244 頁；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 72，新二版，頁 244。

31 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市：三民書局，民 58，初版，頁 471；民 61，增補再版，頁 601；民 66 年，初版，頁 593；民 68，增補三版，頁 601。

32 張金鑑，《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市：三民書局，民 78，初版、《中國政治制度史》，臺北市：三民書局，民 54，初版；民 59，3 版；民 62，4 版，頁 198；民 66，初版，頁 176。

33 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市：食貨出版社，民 43，臺灣版初版；民 71，臺灣再版、《中國政治制度史》，臺北市：啓業書局，民 63，台 1 版；民 62-63，陶希聖、曾資生同編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反共（包含反對帝俄）而不排日帝，也不反美帝，但是排拒「兩個中國」，矢言「反攻大陸」的蔣氏父子，聯手統治臺澎金馬，號稱「自由中國」。而「蔣版」三民主義[34]，雖未被明白舉爲標竿，但貫串其內，蔚然成風[35]。精言之，國家元首蔣中正矢志繼承「國父」孫中山遺志，其中爲今人所注意者，包含：在民族主義之中，相當濃烈的大漢沙文主義，以及以權宜手法，頒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實施威權式一黨專政的黨國思想，但不忘積極且有計畫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領、節制私人資本與發達國家資本的民生主義，以及推動歐美型地方自治，並將政權逐步當地化的民權主義。易言之，威權體制時期主導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中國政治思想的上述作者，雖具有較高的黨性，但希望兼顧倫理[36]、民主和科學[37]，並以新生活運動及文化復興爲主軸，可謂在臺的第二代。

在臺第二代學者對於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的介紹，多以人物爲中心[38]。除了在蔣中正身旁的陶希聖之外，還有張金鑑、蕭公權、陳啓天、陳安仁、謝扶雅、王雲五、楊幼炯等。他們這幾部貫通中國整個思想史的書中，所討論的對象大同小異，但繁簡不同。

謝扶雅的最簡，用二十多頁即說完此段複雜的歷史[39]。

次爲楊幼炯，要言不煩，以維新以後歸屬現代，止於五四以後各

34 戴季陶註解。

35 臺灣的政治思想史學界，與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結合，除要求學生修習外，也列爲大專聯考的必考科目。後來更在全國各主要大學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成爲政府的智庫。

36 姜琦的《中國國民道德原論》（重慶：商務印書館，民 33；臺北：大華印務局，民 35），最具有代表性。

37 蔣中正，《科學的群眾時代、科學的道理》、《科學的學庸》（民 39）。

38 參見王雲五在臺灣商務印書館主編出版的一百冊《中國歷代思想家》。

39 謝扶雅，《中國政治思想史綱》，臺北：正中，民 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社會主義派別[40]。

再次爲陳安仁[41]、陳啓天[42]、王雲五[43]。王雲五在「民國政治思想」主題下，討論孫中山、康、梁、胡適以及張君勱 5 人。蕭主張明清是中國政治思想轉變之時，蓋海運大通之後，西方教士輸入歐洲文藝復興之後，進一步發展出來的機械力文明與基督教文化。自居天下大一統的中國，突然變成「列國」之一[44]。再加上在相互競爭中，中國一再落敗，自不免使有識之士於失望之餘醞釀革命。

張金鑑除了與以上 3 人一樣，都述及太平天國、戊戌維新以及辛亥革命外，另有兩點不甚相同。首先是另闢專章介紹自強運動，其次是用「國民」革命的觀念來詮釋辛亥革命運動時期，而不用「共和」、「民主」或「資產階級」[45]。在自強運動時期的政治思潮中，他不祇介紹支持者，而且及於反對者、調和者的思想。支持者中，包含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魏源、郭嵩燾；反對者包含倭仁、王闓運、俞樾、張自牧等；調和者則爲王韜、馮桂芬、鄭官應、張之洞。討論的對象固然較多，但其分派的標準何在，亦頗難明確[46]，而且因爲涉獵範圍較以上 3 人廣闊，討論人物更多，就比較上屬於介紹性質，不容易分析，特別是有系統的比較其異同之後，進一步掌握足以貫串諸人的新主流，更是付諸闕如。以上是第二代學者的特色。

但是，另外一股蔣氏家族（含宋美齡）與孫中山（含宋慶齡）均極強調但未公開且大力鼓吹的，是渠等對基督宗教的認識與肯定。蔣

---

40 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26，2 版。

41 陳安仁，《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臺灣商務，民 60。

42 陳啓天，《中國政治思想概論》，臺北：華國，民 40。

43 王雲五，《民國政治思想與中國政治思想之綜合研究》，臺北：臺灣商務，民 59。

44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市：聯經，民 71，冊一，頁 6。

45 張金鑑，《中國政治思想史》，第八十七章，〈國民革命的政治思想〉。

46 張金鑑，《中國政治思想史》，第八十五章，〈自強運動的政治思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正在抗戰期間，不只重視「新文化運動」，而且深讀《聖經》。並請吳經熊譯介《聖詠集》[47]，蔣於抗戰最後的三年（民三十二至三十四年），軍務、政務倥傯之際，仍逐節校讀三遍，顯見重視的程度[48]。但是並未被中國政治思想學界第三代的學者所注意。

參、第三代代表性學者的看法

第三代的學者多係戰後來自大陸的青少年或青年移民。他們在臺灣接受高等教育，特別是大學的研究所訓練之後，已對西方學風有所浸淫，故能中西會通，具較廣、較深的研究能力，雖然深受「反共」局限（其中包含反對美國哈佛大學燕京社由 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教授所領導的「兩個中國」權宜性主張，但是完全被兩蔣所否認[49]），仍然足以另闢蹊徑，開創新的時代。

以「中國政治思想史」爲題，撰成通論之書者，汪大華與萬世章爲其中較早者[50]。但是，關於中國近現代的思想家方面，汪大華與萬世章也祇論 5 人，其爲康、譚（嗣同）、梁、孫、蔣，但獨重孫、

---

47 《聖詠集》或譯《詩篇》，即《舊約》中之 *Psalms*，其內容來自猶太人公祭、私禱皆爲應用的經文。詳見：吳經雄熊譯、蔣中正校讀，《聖詠譯義初稿》，臺北：臺灣商務，民 62，臺一版，「朱主教序」、及「凡例」。

48 詳見：吳經雄熊譯、蔣中正校讀，《聖詠譯義初稿》，民 62，臺一版，「主席手諭真跡」。

49 從今天看來，「兩個中國」的權宜性主張極有遠見，但是當時完全被兩蔣所否認，並且將之打爲所謂「費正清集團」。詳見：周之鳴，《費正清集團在臺大陰謀》，臺北：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民 58；周之鳴，《我們爲什麼反對費正清》，臺北：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民 67。周之鳴另有《太平洋學會怎樣出賣中國》（臺北：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一書，亦值得參考。

50 汪大華，民 23 年生，蘄春張塝汪瓢鋪人。臺大政治系第 4 名碩士，論文題目〈中國宰相制度之起源〉，薩孟武指導，民 48 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蔣 2 人，其篇幅分別爲前 3 人的七倍甚至十倍[51]，比重較不合乎常理。此外，二人將康、梁、孫列入不同時代：康梁爲近代，孫則已入現代，與史實不符，顯然滲入國民黨史觀。

蕭公權的說法爲汪、萬兩氏所接受。汪、萬二人依附蕭說，指出近代始自明清之交，其特色如下[52]：

> 在此時期政治思想之轉變……首先爲明清之初，遺民志士以反抗異類政權而發揮種族思想，一變傳統思想中之大同主義。再進乃爲太平天國崛起，本諸基督教義參以民族思想而產生吾國空前之思想轉變。其後國勢日危，所需之新思想更日感迫切，於是國人分從西洋思想中，尋求救國之方，一時有倡洋務運動，國家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等不一而足。

他們認爲，這些不一而足、內容互異的思想，固有多類，但無論所持主義爲何，則沒有一種不是與二千餘年的傳統相對抗的[53]。

不過，兩氏認爲，這種劇烈的轉變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方告結束，「而中國政治思想之成熟時期也隨辛亥革命而到來」，其代表人物，就是孫與蔣。其思想內涵，就是三民主義的五權憲法學說，其中包括共和國家、革命民權、權能區分、直接民權、中央與地方均權、以及地方自治等[54]。他們認爲孫的這些思想，是融合中西政治思想的精華而成的，因此「已臻成熟」，而爲「現代中國（modern China）」的開始。

---

51 汪大華、萬世章，《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市：汪大華、萬世章，民 57，頁 805。

52 汪大華、萬世章，同上，頁 9。

53 汪大華、萬世章，同上。

54 汪大華、萬世章，同上，頁 676-7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則認爲：想清楚呈現時代政治思潮的主流，就不能單用逐一介紹人物的寫法，而要有某個主題，或者深論某個最重要（或者最具代表性）的時代。金耀基、余英時、張灝、許倬雲、李國祁、周道濟、王壽南、賀凌虛、黃彰健、張玉法、呂實強、王樹槐、陸寶千、蘇雲峰等，均曾針對特定人物做專題論述。另外，他們也曾經以主題爲方向討論若干重要觀念。至於有主題，主採文集形式呈現其心得的，則有王爾敏、汪榮祖、孫廣德等。

一、王爾敏教授

王爾敏與汪榮祖採取的就是挑定某一時段的寫法。他們所寫的晚清，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政治思想內涵最豐富的一段，其中，王爾敏的視野較廣，汪榮祖較專。王氏〈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的原質〉一文，首先肯定由於中外接觸頻繁，對中國的思想、制度產生重大影響；其次指出辛亥以前，雖然對西方的認識仍不夠普遍也不夠深入，思想言論也未充分解放，但是，除了沒有提到全面的文化問題之外，凡日後所展現的新思潮大體均已萌芽。與悠久的傳統思想比起來，顯然已經足夠算是一個巨大的變革[55]。

王指出當時中國政治思想人物對於西方的接觸多極膚淺間接，免不了一知半解，而以固有觀念來附和或彌縫其不完備的假設理論。他舉了一個例，說明時人還在固有知識中找根據，而不相信由湯若望、龍華民（Micholaus Longobardi）所述說的西方[56]。使得當年「變」法與維「新」，都仍然具有中國傳統的部分；變而未全變，新亦未全新，也就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精神所在。它代表當代共喻的觀念，

[55]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的原質〉，《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民 65，頁 1。

[56]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的原質〉，頁 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且落實到中國的教育思想與制度上[57]。王又說[58]：

> 現代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國建立穩固基礎，不是單憑外國教士辦學校……。但經中國官紳產生了「中體西用」思想，對於教育的改革，發生了全面的推動力量。……反觀數千年間的傳統教育制度，「中體西用」更是代表一個顯著的大轉變。

因此，他發現每當時人提倡和介紹西方思想時，往往也混入中國傳統的固有思想。兩者滲合，十分自然。此種說法，固然不怎麼具體[59]，仍未築基於基督宗教的整套新式教育體制與中國傳統教育，在政治思想基本觀念上的差異，但在形式層面，的確抓住了要點。

二、汪榮祖教授

汪榮祖在論叢中的首篇，摘出兩大要點，作爲晚清變法思想的核心。其一爲變通思想：以傳統的思想模式、古典的詞彙，來說明新說，其二爲緩進思想：先肯定進化的存在，復主張循序漸進[60]。在變通思想中，除了寓新意於古說之中，對「體」與「用」，也主張不可偏廢。他引用鄭觀應的話，說：「道無器，道不能發生作用；器無道，器不能表現性能。」[61] 換言之，體用非二元，乃一元之兩面。

汪榮祖雖然強調「變法與大同，旨趣雖異，然非思想上之矛盾，而係思想上之不同層次，富強爲當今急需，而大同爲未來之理想。」

---

57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的原質〉，頁 12。

58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的原質〉，頁 12-13。

59 劉吉原，〈張之洞中體西用思想之研究〉，臺大政研所碩士論文，民 70，頁 2。

60 汪榮祖，《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民 72，初版；民 73，第二刷，頁 2。

61 汪榮祖，《晚清變法思想論叢》，頁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實上，把遙遠的未來理想與解決燃眉之急的方策並列提出，在論證上自然免不了相當程度的衝突。

中西政治理想在中國境內接仗的情形，正是上述兩人著作的重點。他們二人是從時代的觀點，以史家之筆，來找尋晚清在中國歷史上的特色。

三、孫廣德教授

孫廣德另闢政治學的研究途徑，以專題撰寫的方式，進入同一個園地，也發覺以上的現象，但內容不同。首先，他將「傳統」與「西化」作爲兩極，逐一檢視自強運動與維新運動兩時期中，倡導與反對西化者的爭論要點。其次，亦著重中體西用說，認爲此說乃爲調和傳統與西化兩大流派而生。他說[62]：

> 到了現在，人們提到「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似乎常帶有譏諷的意味，以爲那是一個不倫不類的口號，或是一種缺乏見識的主張，只看到西學的用，而未看到西學的體。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說，在當時實在具有它的時代意義，是一個比較進步的見解，一種比較妥善的主張。

他同意王爾敏的說法，認爲中體西用理論有三層時代意義，一、認識論方面，代表中國士人對西方在認知上有重大轉變；二、態度方面，代表中國士人對西方態度的一種嶄新的階段，承認西學的學術地位，並視爲足資傅翼中學；三、方法方面，提出一個接受西化的方法[63]。

再次是拿日本與中國相比較，找尋兩個幾乎同時開始西化的國

---

62 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 71.5，頁 171。

63 王爾敏，〈清季知識分子的中體西用論〉，《晚清政治思想史論》，頁 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其西化速度與成績相差甚巨的原因。最後再論及中國傳統文化與西化的關係。他提出四種假設：

一、中國傳統阻礙西化；

二、中國傳統促進西化；

三、中國傳統不阻礙也不促進西化；

四、中國傳統既阻礙也促進西化[64]。

並且證明事實應屬第四種[65]。他認爲[66]：

所謂全盤西化，就是把西方所有統統學來，一點沒有遺漏；把中國變的與西方一樣，沒有一點不同。這不需要解釋，我們就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也許將來可能，但這將來必然非常遙遠，不知在幾千幾萬年之後。

因此，「講來講去，恐怕還是折衷調和的路比較可行。」當然，他也承認，就整個大勢來看，各個文化必然越來越接近，越相似，不過，這種世界性的文化，只是在某些基本而必要的因素上面就可以了，個別的差異依然無法完全抹滅的。

從政治思想的要求出發，在探索晚清的特質時，孫廣德發現，其最要處並不在政治制度，而在整體文化。

事實上，中國自十九世紀以來即已進入全面變革時期，一直到今天，因此，國外有許多學者以「變」[67]，或「革命」[68] 爲核心，來詮

64 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頁 184-185。

65 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頁 189。

66 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頁 200-201。

67 Mary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 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New York, Atheneum, 1966, p.63，轉引自孫廣德，同前，頁 187。

68 以「革命」爲核心觀念來論中國近代史的書籍太多了。其中較著者，有以下幾部：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Haven: Harper & Row, 19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釋中國近現代史。把這個觀念，與上面對政治思想研究的論介結合起來，就可以發現，探討中國近代史，所涉並非某一孤立的面向，所變亦非某一孤立的領域；它涉及整體的、所有面向的變或革命。它是思想整體的變革。

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似乎都步向比較尚功利，或者說是實用或重視實利之路。〈龔自珍的政治思想〉[69] 就是這方面的力作，而〈龔自珍的經世思想〉[70] 更直接討論實用致世的內涵。後者曾於當年應邀，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世思想」研討會上宣讀，並且收入近史所《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民國七十三年三月）當中。而前者篇幅較大、論列更深更廣，以公羊家的「因時變、應時需」的精神，積極地主張變法改革以及仿製西洋器物，更進步凸顯傳統儒者力求突破，將內聖外王爲主要訴求的舊傳統，改爲針對時弊，在統治組織、統治方法、統治手段等方面，從禮儀、祭祀、官職、官風、稅制、兵制等項目，具體求變的努力。當然，任何人的思想都有其局限。孫教授說：龔自珍也有他時代的局限，例如主張抑商、用女樂以消耗士人

Mary Wright,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 Press, 1968.

Franke Wolfgang, *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851-1949*,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58.

Chun-tu Hsue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new perspective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86.

菊池貴晴，《現代中國革命の起源；辛亥革命の史的意義》，京都，（有）巖南堂，昭和 56，新訂 3 刷。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69 孫廣德，〈龔自珍的政治思想〉，《政治學報》，期 12，民 73.12，頁 191-291。

70 孫廣德，〈龔自珍的經世思想〉，《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73.4，頁 275-2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財精力，爲的是控制其議論等等「治術」。其思想的正反兩面，均經孫教授指出，並且明白加以肯定或評論。

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傳統政治智慧對西式政治制度、思想、政策、民情等的思考、接納、爭議、批判及反動。時下的知識份子處理傳統的、特別是保守的這一類思想，每多貶抑，甚至不屑一顧。孫教授則不然。他一直保留自己在比較冷靜的情境，因此能夠不以人廢言。〈倭仁的政治思想〉[71] 就是例子。倭仁爲蒙古正紅旗，道光九年進士，信守儒家思想及宋明理學，而且性行嚴謹，以孟子所謂的「大臣」之道來事君。這種人的思想，事實上代表中國當年政治思想的主流，自然值得深入了解。不過，孫教授也指出，他「過於迂謹，所以偏於守成，而難以進取，致有違背時代潮流的主張與言論。」[72] 孫教授很清楚地指出倭仁思想的重點所在：

> 當時倡導洋務的人，要在求中國的富強，而倭仁反對洋務，頗易令人誤認其不求富強。實則儒家思想與理學都不反對富強，而且其中都包涵了富強，倭仁既信守儒家思想與理學，也自然會求富強。但儒家思想與理學的重點仍在人倫道德，尤以理學爲然，一方面認爲富強是講求人倫道德的必然結果，一方面認爲講求富強的途徑必由人倫道德。倭仁也是如此，這就是他奏摺中所說的「尚禮義不尚權謀……在人心不在技藝。」

不過倭仁反對洋務的主張，在當時曾發生極大的影響。之所以如此，孫教授認爲有更深刻的內容。因他反對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招取正途出身者前往學習，竟然造成士人裹足不前，「而詞館曹郎

---

71 孫廣德，〈倭仁的政治思想〉，《政治學報》，期 10，民 71.12，頁 135-205。

72 孫廣德，〈倭仁的政治思想〉，頁 2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皆自以下喬遷谷爲恥，竟無一人肯入館者」。這一方面固然由於「時倭文、端方爲首揆」，地位顯要；而一方面卻也由於倭仁並非根本反對富強，且其主張也頗能言之成理。

孫教授引用陸寶千教授的看法，指出：「倭仁之斷斷與恭王等相難，實與理學者力圖自強之心聲相共振」；倭仁主人格之陶冶，倡導洋務者主事業之創建，而「健全之人格乃一切事業成功之必要條件……故知倭仁等所說不爲無見，與船堅砲利之論並不衝突。此恭王等歷次辯難，所以不能服其心也」。

孫教授明白地下了結論，他肯定陸寶千教授之說，不過他懷疑所謂「倭仁等所說」「與船堅砲利之論並不衝突」。他以畫龍點睛的手法，強調倭仁的保守的確有矛盾存在，不用替他掩飾，因此：倭仁所說，應當是指求富強的目的而言，在方法上則很明顯的相互衝突，而且，孫教授道出了最終極的特色：儒家、理學家以至於倭仁，雖也求富強，但「富強並不是他們的最高目的。」[73]

四、中央政府遷臺後培植的第三代：以孫教授爲範式

隨著中央政府進入臺灣的「戰後新移民」[74]，經過 20 年以上的培育，已成爲臺灣地區中國政治思想研究的第三代。由於教育普及，使得第三代學者人數眾多，甚至無法勝數，而且多有頭角崢嶸之士。這些人，目前已成爲海峽兩岸及世界各國的主流學者，其中之一就是孫廣德教授。

孫廣德教授出生山東省，但在弱冠之年即來臺。碩士、博士學位

---

73 孫廣德，〈倭仁的政治思想〉，頁 203。

74 在我所主持的《續修臺北市志》計畫的團隊中，有世新大學喻蓉蓉教授，最早提出此一「戰後新移民」的概念。這個概念，在民國 97 年 5 月 20 日馬英九的就職演說中，也被採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均在臺灣完成，因此既有大陸經驗，又是本地學者[75]。其問學，貫穿古今三千年。他以冷靜客觀的態度，明白簡單的筆法，用泰西新近社會科學方法，切入古聖先賢的政治思維。能將複雜問題如此深入淺出地處理，相當不易。

他的碩士及博士學位得自我國最早有政治學系的國立政治大學[76]，而且是政治思想史已故名師政大鄒文海教授最欣賞的及門弟子之一[77]。國內政治學界的人士心中都十分明白：要想在政大政治學系用三年的時間拿到博士學位，是十分困難的[78]。但孫教授做到了，可見其根柢與功力之深厚，相當受到指導教授鄒文海的肯定[79]。

他的處女作是《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早期成名作則還有《先秦兩漢陰陽五行說的政治思想》等。此外，《晉南北朝隋唐俗佛道爭論中之政治課題》、《政治神話論》以及《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三部專書，也是費力甚鉅、擲地有聲的作品。還有，他在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講義，深入淺出。後來我跟他合作編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中[80]，先秦與秦漢的主要部分，都來自他的講義[81]。專書之外，另有已發表並且得獎的論文，高達 30 篇。乍

---

75 雖然並非「本土」出生，但是其夫人爲臺大園藝系知名教授，出身臺北著名的「江山樓」老街：歸綏街，比絕大多數本土人士更本土。兩人聯手，更能客觀看問題。

76 學士學位得自前省立法商學院（後來改爲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近年再改爲臺北大學）的行政系。

77 爲何說「最欣賞」？有兩個證據：鄒教授是抽煙的，他當年的煙灰缸，現在在孫教授家；還有，孫教授在他的指導下，3 年之內就取得博士學位。

78 或其他大學（如臺灣大學等）的政治學系。

79 另一位鄒教授的最得意門生，應非已故政大教授朱堅章莫屬。朱老師負責在鄒老師身後，編纂出版其膾炙人口的遺著：《西洋政治思想史稿》。

80 孫廣德、朱浤源等合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民 86.1，頁 426。

81 當然，其他章節則廣泛參考賀凌虛教授、盧瑞鍾教授、黃競新副教授、葉仁昌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看之下，似在數量上不能和錢穆等人相比，但他質量均高的每一篇，都深入淺出，都是獨立創作而且別有見地。事實上，他的作品遠遠超過這個數量，而且包含詩集、小品、散文、社論以及專論政治、哲學、教育思想等等的文章至少 60 篇[82]。再加上專書 11 本，以及其他論文和書評等，至少 120 單位。基於這些富厚的功力以及勤勉不懈的耕耘，他擔任教授數十年以來，每一年都得到國科會的獎助[83]，並於民國八十一年獲選臺灣大學法學院，也就是今天的社科院與法律學院聯合舉辦的「連震東講座」的第二屆法政講座[84]。

他從中、西哲學出發，進入經、史、子學，再綜合教育學、心理學的社會科學家，並將重點放在政治思想的深層，特別是政治理論部分，而且試著在威權體制下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因此，想要忠實地介紹他並非易事：如果單用歷史研究法，自然離真實太遠；即使是用思想史的研究法，也祇能摸到邊，不明究竟。怎麼辦呢？

本文強調：研究政治必須注意統治的主體、客體、統治的原理、制度組織、方法與手段。而研究政治思想史，就要找出思想家（與從政者）的有關統治的論述、政策與措施，以便從中發掘其特色、優缺點、深層的關連以及時代的意義。現在試著以這樣的架構，來看孫教授的研究成果，以及其關懷與用力的主要方向。

教授和林俊宏博士的若干作品。

82 參見：孫廣德，《閒思集》，臺北縣新店市：桂冠圖書，民 91，頁 277。

83 而且還曾經獲得菲華特設「中正文化獎」的第五屆優良著作獎、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優等研究獎等。

84 按：第一屆民國八十年度法政講座的得主是政治學系胡佛教授，第三屆民國八十二年是法律系蔡墩銘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孫教授兩大主要切入點：縱向與橫面

介紹孫廣德教授的學術成就並不容易，原因在於他問學的根柢較深，滲透也較廣：從先秦到民國初年，這前後三千年期間的中國政治思想家，數量非常之多。其中相當多位都在他規撫研究之列，而且分從縱向與橫面兩大類切入：

一、縱向貫串

縱向貫串研究，在沒有電腦的時代是非常困難的：想前後一以貫之了解歷代政治思想家對某一主題的看法，就必須「單點貫串」，也就是要細讀前後三千年具代表性思想家的相關著書。在沒有網路可以蒐尋，史書亦未上網的當年，這需要大量硬工夫、耐性、以及智慧，是相當困難的事情。但是孫廣德教授做到了，而且，不只一次。他分別以神話[85]、成就[86]、政權轉移[87]、德、力[88]、賢人[89]、無爲而治[90]、義

---

85 孫廣德，《政治神話論》，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 79.9，頁 297、〈我國正史中的政治神話〉，（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30，民 71.9，頁 29-76。

86 孫廣德，〈我國傳統思想中成就定位與成就觀念的檢討〉，（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35，民 76.3，頁 9-24。

87 孫廣德，〈我國古代政權轉移理論之研究〉，（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24，民 65.3，頁 289-317。

88 孫廣德，〈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之德與力〉，《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64，民 81.3，頁 189-208。

89 孫廣德，〈柏拉圖與先秦儒家賢人政治及階級觀念比較〉，《中國國學》，期 9，民 70.9，頁 56-62。

90 孫廣德，〈先秦儒法道三家的無爲而治思想〉，《第一屆中國思想史研討會論文集》，東海大學文學院，民 78.6，頁 1-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務[91]、民本[92]、民權[93]、君臣民關係[94]、天道[95]、陰陽五行[96]、實利[97] 等，至少 13 次，以 keywords（關鍵詞）作爲主題，從先秦到近代，縱向貫串翻閱古書，研究歷代政治思想家的主張。

二、橫面剖析

除了縱向的一以貫之以外，他也做橫面的剖析。橫面剖析的焦點，又分兩種：一個是人物探究 — 將其一生思想予以個別探討，另一個是主題論述 — 通論當代與該議題相關之言論與行動。他的重點如下：

(一) 人物探究：以先秦和近代爲主

許多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家，通常終其一生，祇挑選若干人加以論述，而且以通論其整體思想爲主。孫教授不然。除了曾經討論

---

91 孫廣德，〈我國古代政治思想中之義務觀念〉，《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卷 19 期 1，民 75.6，頁 119-133。

92 孫廣德，〈我國民本思想的內容與檢討〉，（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36，民 77.3，頁 401-438。

93 孫廣德，〈戊戌前後的民權思想（1894-1903）〉，《變法與立憲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70.8，頁 8-33。

94 孫廣德，〈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32，民 73.12，頁 173-223。

95 孫廣德，〈春秋時代上層社會的天道觀〉，《東亞季刊》，卷 5 期 3，民 63.1，頁 13-27、〈孔孟荀的天道觀〉，《孔孟月刊》，卷 13 期 7，民 64.3，頁 11-16、〈我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天道觀〉，《中國國學》，期 16，民 77.10，頁 91-126。

96 孫廣德，〈五德終始與朝代更替〉，《中山學術文化集刊》，集 2，民 57.11，頁 141-181、〈陰陽五行說與漢代政治（單行本）〉，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民 66.2，頁 1-27、《先秦兩漢陰陽五行說的政治思想》，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 82.6，頁 320。

97 孫廣德，〈顏元與李塨之實利思想〉，（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27，民 67.11，頁 41-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代重要思想家，特別是老子、孔子、孟子、莊子、荀子、墨子、鄒衍等 8 位先秦思想家的政治論述之外，更將焦點放在近世，特別是近代以來的思想家。他曾經專文深入介紹過的近世思想家、集中在明清兩代，間亦及於元末以及民國初年。

他所介紹的近代這些思想家，依時間順序來看，計有元末的方孝孺，明初的劉基、薛瑄，明中葉的呂坤、張居正，明末的王船山、顏元、李塨，清初的唐甄，清中葉的龔自珍、倭仁。可見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至少 11 位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都在規撫之列。

先秦 8 位、近代 11 位，是他的重點。此外，他也曾經討論先秦法家的其他要角，如管仲、鄧析、李悝、戶佼、慎到、申不害與商鞅；秦漢時期的法家李斯、《鹽鐵論》作者，儒家董仲舒、陸賈、賈誼，雜家呂不韋、淮南子（劉安）以及東漢的王充，也有所論列；魏晉時期阮籍、鮑敬言。以上至少 17 位，在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未刊稿之中，也佔有相當份量。與先秦 8 位以及近代 11 位思想家相加，孫教授深入論列的人物，至少有 36 位。

(二) 主題論述

另外有一些關於近代政治思想的書籍與論文，以主題的形式展開。孫教授嘗試扣緊中國近代思潮的核心脈動，把最重要的幾個政治議題，先提出定義，再就不同階段、不同流派的相關爭論加以介紹、排比，加上檢討，最後又在結論中明白加以總結以及評論。他所挑選的議題，至少有 4 種：

第一，傳統與西化的看法。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兩大時期，分別論述各派爭論的內涵[98]。

第二，對民權的看法。以戊戌時期前後 10 年（一八九四至一九

[98] 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 71.5，頁 2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的主張，作爲討論的對象，以了解洋務與維新運動時期的民權理論[99]。

第三，對民主政治的提倡與設計。在討論洋務與維新運動時期對西化，特別是民權的看法之後，孫教授進入憲政運動時期，也就是一九○○年到一九一一年的清末最後 12 年，就民主政治的範圍，以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陳天華、嚴復、康有爲、梁啓超爲對象，針對革命與君憲兩大派的論點，深入討論有關自由、平等、權利、義務、民主體制等的觀念與制度[100]。

第四，對民主的看法。民國剛剛成立，在袁世凱、段祺瑞、張勳、馮國璋等人主政的北洋政府（民國二年到八年）時期，以反動派、維護派與闡揚派人士的主要看法，作爲討論對象，來論列比較。反動派包含嚴復、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楊度、宋育仁、勞乃宣與張勳；維護派包含梁啓超、「秋桐」、「重民」、「林平」、「箸超」、汪鳳瀛、「稟秋」、徐佛蘇；闡揚派包含陳獨秀、高一涵、張東蓀、「傖父」、「高勞」、「竹音」、「待英」[101]。

對於以上兩類三種的切入法，孫教授均下了許多工夫，而且分別又有豐富的作品。他究竟如何論述？依個人淺見，可以再進一層，分爲以下幾方面，來逐層論述：

---

99 孫廣德，〈戊戌前後的民權思想（1894-1903）〉，頁 8-33。

100 孫廣德，《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論集》，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民 88.5，頁 281。

101 孫廣德，〈北洋主政時期民主思想的反動、維護與闡揚（上）〉，（臺大）《政治科學論叢》，期 7，民 85.6，頁 1-38、〈北洋主政時期民主思想的反動、維護與闡揚（下）〉，《政治科學論叢》，期 8，民 86.6，頁 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伍、中國統治主客體論述：君最受重視，其次為臣，再次為民

談到政治，就必須先確定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才能進一步再看治與被治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要明白統治的主體（subjects，也就是統治者）與客體（objects，也就是被治者）。

〈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102] 一文直接處理這個問題。他將之分爲兩個層次：一、階層流動，二、主客體關係。

一、階層流動

孫教授引用西人 Bernerd Barber 的階層理論，從社會階層的區分以及其間的流動，說明統治的主體與客體之間並非固定不變的。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認定。因爲即使到了資訊發達的今天，我們有許多人還誤以爲古代是個「封建」的社會，百姓世世代代受奴役，而君王則世世代代爲君王。他明確地點出：「商周雖是封建社會，尤其周朝的封建制度非常完備，但仍有社會流動；商朝的平民可以向上流動爲臣，周朝平民中的士也可以爲小吏。至於秦漢及其以後，自然有更多的社會流動。這些都是事實。」[103] 他引用黃宗羲的論點，指出若干思想家堅持「三者之間的流動是很自然的，很通暢的」[104]。

[102] 孫廣德，〈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頁 173-223。
[103] 孫廣德，〈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頁 49。
[104] 孫廣德，〈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頁 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主客體關係

在統治的主體與客體之間，孫教授發現中國古人微妙而複雜的區分法：在統治的當然主體 —「君」，與統治的當然客體 —「民」之間，還有一個既像主體也像客體的「臣」存在。我發現他的這種區分，非常重要，正足以破二、三十年以來學界若干人提出的「state vs society」[105]，也就是「政府與社會是相對立」的謬論。因爲臣一方面是統治者，是 state 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臣也是被君統治的；在相當層次上，他也是被治者，是 society 的一部分。今人以政府與社會爲兩極，是一種不符事實的認定。真正的事實，從孫教授的理論可以推論出來：民與臣之間的高度流動，使政府基本上是社會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將民意做相當深刻的反映，不可能長期對立。若有對立，也出在幾個獨裁或者無能的君主的誤導。一般而言，臣是君與民溝通的正規橋樑。

接著他用角色理論，配合階層理論加以分析，並將焦點放在最重要的先秦，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儒、道、墨、法四家。他說：「在理論上，先秦儒、道、墨、法四家諸子對君、臣、民的角色期待，與君、臣、民階層流動的見解，各有不同。就對君、臣、民的角色期待而言，如以儒家爲基準加以比較，墨家與儒家最爲接近，而道、法兩家則各趨極端。」[106] 儒、墨兩家要求君與臣的比重，高於要求民；法家要求臣、民的比重，高於要求君；道家表面上似乎都不太重視，因爲主張順從自然，反對有所作爲，其實不然。孫教授緊接著說[107]：

---

105 「vs」，乃係介係詞 versus 一字的縮寫，意指其前、後兩個字之間，具有對立的意義。

106 孫廣德，〈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頁 49。

107 孫廣德，〈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頁 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各家對各角色的評價雖有不同，但基本上卻仍有相同之處，譬如各家都最重視君的討論，其次爲臣，再次爲民，可見各家的價值體系間，仍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當然君最受重視，其次爲臣，再次爲民，這是當時政治社會中的事實。又可見各家價值體系與政治社會的事實間，也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

根據這樣一個價值體系，中國古代思想家要求君、臣、民的嚴格程度，也有了明顯的差異。其中自然以君被要求的最爲嚴格。他說：「君、臣、民的角色的社會功能既然不同，而爲了履行不同的社會功能，便需要不同的才能與訓練，無可否認的，君需要最大的才能與訓練，臣次之，民需要的才能與訓練最小。」[108]

他的〈柏拉圖與先秦儒家賢人政治及階級觀念之比較〉[109] 一文，提供讀者一些令人訝異的發現。在比較希臘哲人柏拉圖（Plato）名著《共和國》（*The Republic*）與《法律》（*Laws*）兩書之後，孫教授發現柏拉圖與先秦諸子看法若合符節之處甚多，特別是對「人治」的堅持[110]。而且，「孔、孟、荀始終主張賢人政治，柏拉圖卻先主張賢人政治，後主張富人政治，而富人未必就是賢人。」[111]「所謂賢人政治，就是以好人爲政；而主張以好人爲政，也就是主張人治……」。

爲何柏拉圖會以賢人或富人來統治，而孔孟荀祇要求賢人？孫教授也深入加以探討。他指出關鍵有二：首先，他們都有階級觀念，而把人畫分成階級；其次，他們對階級之間的流動有不同的看法。柏拉

---

[108] 孫廣德，〈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頁 48。

[109] 孫廣德，〈柏拉圖與先秦儒家賢人政治及階級觀念比較〉，《中國國學》，期 9，民 70.9，頁 56-62。

[110] 孫廣德，〈柏拉圖與先秦儒家賢人政治及階級觀念比較〉，頁 56。

[111] 孫廣德，〈柏拉圖與先秦儒家賢人政治及階級觀念比較〉，頁 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認爲階級與生俱來，先秦諸子則認爲階級可以流動。問題的答案，來自階級畫分的根據，是「後天的努力與成就」。他說[112]：

> 柏拉圖把一國之內的人分爲治國者，衛國者與生產者三個階級，分別由金質之人，銀質之人與銅鐵質之人充當。而人之有金質、銀質與銅鐵質之分，是出於天生，生來便是如此：因而其階級的畫分是根據出生，也就是說人生來便有階級之分，爲治國者、衛國者或生產者，生來便決定了。而孔、孟、荀的見解則不是如此。……依照孟子與荀子的說法，階級畫分的根據是後天的努力與成就，……。

可見當年東、西兩個世界的思想家，在統治主體與客體之間關係的論述上，東方的先秦諸儒，比西方的 Plato 還要來得更爲「現代」（modern）與「開放」（open）。

當然，孫教授的關懷決不僅止於古代，而更關懷近代。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他也舉出許多前進思想，這裡以王船山與唐甄爲例：在〈王船山思想中的君主角色〉[113]，他介紹船山的君位君權的「相對主張」；在 〈唐甄的政治思想〉[114]，他介紹唐氏最獨特的兩大主張：

首先是盡量壓低君主地位，相對的提高臣民地位，而寓有君民平等的精神。不過雖稱獨特，孫教授接著說：只是如孟子般出於傲視君主的氣魄，以及對其前或其時抑制君權思想的加強，而與侯外廬所說的「民主政體」無涉，也非「虛君立憲的萌芽思想」。

---

[112] 孫廣德，〈柏拉圖與先秦儒家賢人政治及階級觀念比較〉，頁 57。

[113] 孫廣德，〈王船山思想中的君主角色〉，《哲學與文化月刊》，卷 20 期 9，民 82.9，頁 848-859。

[114] 孫廣德，〈唐甄的政治思想（上，下）〉，《食貨月刊》，卷 15 期 11、12，民 75.6，頁 30-54；卷 16 期 1、2，民 75.9，頁 67-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次是斥罵歷代帝王爲盜賊。唐氏一方面壓低君主地位，一方面又加重君主責任，以爲亂天下亡天下，以至於殺戮人民，其責任皆在於君；因鑑於歷代殺戮之慘，乃認爲自秦以來，歷代帝王皆係惡毒之盜賊，因爲他與盜賊同樣殺戮人民[115]。

孫教授肯定地說：「歷代學者對某些特定的暴君，如桀、紂、秦始皇等，多加斥責辱罵，但對自秦以來所有帝王一律加以斥罵，全視之爲盜賊，而無有例外者，恐唯唐氏一人而已。」他對唐甄在十七世紀的敢於衝決網羅，給予高度的評價，但是又再深一層，思考中國式統治的原理原則。

陸、中國統治原理的論述：重視德而不太重視力

孫教授所論述的統治原理，主要集中在德（道德；ethics）、力（權力；power）、倫理、民本以及義務五個基本概念。這五個概念，從今天西洋政治思想的角度看，似乎有掛一漏萬之嫌，因爲權利、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法律、人權等重要觀念，都付之闕如。其實不然。爲什麼呢？因爲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從先秦以至清中葉所重視的，並非西方的這些觀念，而環繞在孫教授所介紹的五點上面。

其次，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夠妥善掌握道德、權力、倫理以及民本精神和義務觀念，則這些要素所融合形成的社會，不可能沒有權利、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法律以及人權。孫教授在他接受「連震東講座」的典禮上做專題演講時，更明白指出「民主」等概念的神話氣質。在今天全球各國莫不自許民主的時刻，他提醒世人，不要當局者

[115] 孫廣德，〈唐甄的政治思想（上，下）〉，頁 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迷。他說[116]：

> 現代科學發達了，知識進步了，應該不會相信神話才對。其實不然，因爲時代變了，神話也會變的，譬如從前的神話總以天、神、鬼、天使、魔鬼等爲角色，而現代的政治神話則是以國家、民族、民主、自由、民意等爲角色。卡西勒說：「如果將當代的政治神話分解爲元素，將發現它們沒有全新的面貌。」意思就是說現代政治神話中的國家、民族、民主、自由、民意等，與從前神話中的天、神、鬼、天使、魔鬼等，都是一樣的東西。不過現代的政治神話把從前神話中的角色改變了名稱，也改變了表現的形式而已。現代的人把講天、神、鬼、天使、魔鬼的故事視爲迷信，卻不把講國家、民族、民主、自由、民意等的論說視爲迷信，因而這論說如果能符合他的願望，表現他的願望，他就會相信的。

〈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之德與力〉[117] 提出他通觀中國古代以至清代，前後三千年的思想家屈指難數的著述之後，所做的結論。他認爲歷代思想家或從政者，對「德」與「力」的見解可分爲五類[118]：

1. 重德輕力，幾乎否定力（不言力）：有先秦的莊子，唐的李翺，宋的司馬光、蘇洵、蘇軾、蘇轍，明的王守仁、方孝孺等。
2. 重德輕力，然不否定力（先德而後力）：有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墨子，秦的呂不韋及其門客，西漢的陸賈、董仲

[116] 孫廣德，〈民主的神話〉（連震東講座講稿），民 81，頁 104-105。

[117] 孫廣德，〈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之德與力〉，《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64，民 81.3，頁 189-208。

[118] 孫廣德，〈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之德與力〉，頁 2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舒、楊雄、黃老學者及君主大臣，魏晉的何宴、王弼、阮籍、嵇康、劉伶、張湛、向秀、郭象，隋的王通，宋的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朱熹，明的呂坤、李贄，清鴉片戰後的保守人士等。

3. 德與力並重：有西漢的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東漢的王充、王符、荀悅、崔寔、徐幹、仲長統，唐的柳宗元，宋的李覯、王安石、陳亮，明的劉基、張居正，明末及清前半期的學者，清鴉片戰後的開明人士等。
4. 重力輕德，而不否定德：有漢的晁錯、黃生、杜周、張湯、桑弘羊及《鹽鐵論》中所載的其他丞相、御史大夫等。
5. 重力輕德，否定德：先秦的《商君書》作者、韓非，秦的李斯，宋的葉適等。

根據這些資料，孫教授看出兩點：第一、中國自古以來，大多數的重要學者，都曾討論或涉及德與力的問題，這證明德與力正是中國政治思想的中心課題。第二、合計中國自古以來，討論或涉及德與力問題的重要思想家及學者來看，要以重德的人多，重力的人少。特別重視德而不太重視力，更是中國政治思想的特色。只有極少數統治者明白宣示重力不重德，如曹操在建安十五、十九、二十二年，曾數度下令求才，專要「負污侮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可算例外[119]。掌握權力之人不宜強調權力，而應強調道德，的確是中國政治思想的特點。

爲何古代中國人會以道德，而不以權力作爲政治思想的核心？我們知道，權力（power）的觀念是現代政治學最基本的元素，沒有它，

[119] 孫廣德，〈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之德與力〉，頁 2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幾乎不用談政治[120]。然則爲何中國舊傳統與西人今天理念不同，在論述當中沒有它的蹤影？

孫教授並未直接處理這個問題。因爲他更希望問的是：爲何獨有道德的蹤影？以正面地找尋政治上的道德中心論的根源，來代替負面地詢問 why not 之類空無的問題。

他所發現的答案，讀者一定不會吃驚，因爲這是了解中國古代政治的人所耳熟能詳的。他說：道德之所以獨大，原因在於政治與倫理之間的關係。孫教授指出：中國人政治與倫理是接近「合一不分」的。而且，這種合一不分，是經過理性設計出來，而非自然產生的。因爲中國人企圖在二者之間作「適當的調和」，也就是：「一方面再把政治與倫理合起來，一方面要想法免除或適當解決前述政治與倫理不分的難題。」[121] 孫教授這種說法，爲中國政治文化以倫理主導的正當性以及其原因，做了深入淺出且雋永的闡明。

對於民本思想，他基本上十分贊成，因此特別以專文〈我國民本思想的內容與檢討〉[122] 深入討論。他將民本思想「視爲一種限制君權思想的思想」，而其內容主要有三：「尊重民意」、「重視人民地位」以及「安民、保民、養民、教民」。文中依序「論述民本思想的內容。然後依所述內容，進行檢討，先與民主思想相互對照比較，以窺探民本思想的確切意義與本質；次由歷史事實，觀察民本思想對實際政治的影響；最後以缺乏鬥爭精神、報應說的信仰、真命天子思想、人治觀念等，說明中國民本思想不能發展爲民主的原因。」[123]

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現在寧願選擇民主，而不選擇民本，但那

---

[120] 胡佛院士最強調 power，認爲是政治研究的重點。

[121] 參見未刊稿：〈我國傳統政治思想中之倫理觀念及其難題〉，頁 25-26。

[122] 孫廣德，〈我國民本思想的內容與檢討〉，（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36，民 77.3，頁 401-438。

[123] 孫廣德，〈我國民本思想的內容與檢討〉，頁 4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只是籠統地就民主與民本的整體來說。實則民本思想中，仍有些精神較民主崇高，而值得我們取法，譬如民本思想中的安民、保民、養民、教民，雖似君主的恩德，不是人民的權利，沒有確切的保障，但卻對君主以聖賢相期，要求他做得好。對於民主的功能，孫教授提出保留。他說[124]：

> 民主思想中的爲民服務，雖然執政者的職責，是人民的權利，有確切的保障，但因對執政者以公僕看待，只要求他不違法；不違法只是與法律規定相符合，未必做得很好。

能夠做得好，當然優於僅是不違法，這是民本精神較民主精神深刻、實際以及崇高而值得取法的原因之一。他又說：再如我們曾說民本思想下的政治是一種仁政，是要君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存著恤民愛民之心去做安民、保民、養民、教民的工作。而「民主思想下的政治是責任政治，而所謂責任政治，只是要求執政者爲民服務盡責任負責任而已」。孫教授這些說法，比較深刻；一般人如果沒有冷靜而且誠懇的態度，以及深入的政治思維，就沒有可能了解，也不可能接受。那麼，爲何中國人重視民本呢？因爲中國古代自我的修鍊，與自我的要求，因此強調的是「義務」，而不是「權利」。對於此，〈我國古代政治思想中之義務觀念〉[125] 有深刻的論述。

因此，義務、道德以及民本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三大核心觀念，而執行的要領，就在倫理的維護上面。倫理要如何來維護，才能產生統治的功效呢？就牽涉到具體的統治組織、方法與手段。

---

[124] 孫廣德，〈我國民本思想的內容與檢討〉，頁 437。

[125] 孫廣德，〈我國古代政治思想中之義務觀念〉，《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卷 19 期 1，民 75.6，頁 119-1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柒、孫教授論「民本」統治的制度、組織、方法與手段

孫教授問學，以政治思想爲主要範圍，特別論斷從先秦到晚清的時段。這個時期的思想家，雖然確有一部分曾經討論統治組織或政治制度、政府，但人數上比較少。因此，孫教授在這方面也較少著墨。在古代的討論中，以政權轉移爲主，重點放在政體的本質上面。不過，也僅是理論上的探究，沒有真正進入制度的內部。

一、制度性論述：民主與民本

與制度有關的研究，似乎以〈清末憲政運動時期民主政治的提倡與設計〉[126]，以及〈北洋主政時期民主思想的反動、維護與闡揚〉[127] 兩篇近作爲主，重點放在政體的本質上面。這兩篇作品當中，孫教授似乎與原來偏重民本的做法有所不同：在「民本」與「民主」之間，逐漸偏重民主。民國八十四年發表的文章列舉嚴復、康有爲與梁啓超諸說，主張從培養人民自治能力下手；也列舉孫中山、陳天華等，主張建國應分軍法、約法以及憲法之治來循序漸進。另外還介紹不少人，「主張研究憲法、普及教育、設立地方議會，實行地方自治。」[128]

民國八十六年的文章再進一步肯定「民主思想是世界潮流，也是中國必然要走的路，實行之，不僅可以使政治現代化，也可以帶動其

[126] 孫廣德，〈清末憲政運動時期民主政治的提倡與設計〉，《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71（下冊），民 84.10，頁 1-34。

[127] 孫廣德，〈北洋主政時期民主思想的反動、維護與闡揚（下）〉，《政治科學論叢》，期 8，民 86.6，頁 1-20。

[128] 孫廣德，〈清末憲政運動時期民主政治的提倡與設計〉，頁 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方面的現代化」，如果竟然有人要「加以反對，要回頭、要倒退、要取消共和恢復帝制」，那麼不僅阻礙進步對國家民族有害無益，而且孫教授明白地說，「會『違背潮流』，因此根本是走不通的。」[129] 以對民主的肯定爲立論基礎，再憑以論斷民國初年反對民主、維護民主以及闡揚民主思想諸人的看法。

二、統治組織

統治組織也可以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結構來看。以前，他從階層的流動來看君 — 臣 — 民三者之間的關係，來了解先賢關於統治組織的看法。民國七十三年，他的〈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一文，就可以從統治組織的觀點來重新理解：「就對君、臣、民階層流動的見解而言，儒、墨兩家最接近，認爲君、臣、民三者之間均可流動。道家與儒、墨也相去不遠，而法家則與各家根本相反。」比較起來，在統治組織之中，其成員的屬性是否可以變動，各家的意見不同：「似乎是墨家的君、臣、民流動途徑最爲暢通，其次是儒家，再次是道家，最次是法家。」[130] 先秦以外，更論及秦漢直到近代的情況。其中特別介紹唐代韓愈與明末黃宗羲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說[131]：

> 韓愈的見解似乎更超過法家，連臣、民之間的流動途徑都不能暢通，臣只能向下流動爲民，民卻很難向上流動爲臣。黃宗羲的見解則較特殊，雖然就君、臣、民之間均可流動來看，似與儒、墨、道的見解相同，但他不承認君、臣、民爲三個不同的階層，因而君、臣、民之間的流動，不是階層間的上下流動，只是平面的角色變換。

[129] 孫廣德，〈清末憲政運動時期民主政治的提倡與設計〉，頁 34。
[130] 孫廣德，〈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頁 222。
[131] 孫廣德，〈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頁 2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早期的介紹君主時期的政治思想，到最近的介紹反對與肯定民主制度的各種說法，孫教授從思想切入，就發現民本主義與民主主義的一前一後，出現在中國政治思想的三千年歷史之中。這種發現，似乎也代表了他研究對象的改變，其中包含了價值判斷在內。

不過，孫教授近年的肯定民主，並不預設與過去數十年的肯定民本相對反。因爲民主祇描述一種過程，重視的是形式的意義，民本所述，則具有實質的內容：要求統治者以人民爲根本，也就能扣緊以人民的福祉爲終極目的與判準的大原則，而不論其形式爲何。

三、統治的方法與手段

孫教授也論述有關統治的方法與手段。

以人民的福祉爲目的，是孫廣德教授研究歷代政治思想家的核心關懷。他的這種關懷，透過對思想家個人政治思想的介紹，得以深刻地表達。這裡限於篇幅，祇介紹近代的一部分。而以呂坤（一五三六至一六一八）、顏元、李塨、王夫之、唐甄、倭仁爲例，來簡單敘述。

呂坤政治思想中的一大特色，是他的思想與策略、措施完全一貫、一致甚至合一。孫教授發現：他似乎是依思想擬定策略，依策略採取措施；又似乎是由措施化爲策略，由策略化爲思想。換言之，他確實能將統治原理融合到統治的方法與手段裡面，使理論與實際結合。「譬如講養民時所講的救濟與儲蓄，講教民時所講的鄉約與社學，講臣的職責時所講的教官之職、知州知縣之職、守巡道之職，講臣的行爲時所講的盡心滿分、留心鄙瑣、戒喜事等，可說是措施，也可說是策略，又可說是思想；既是思想，也是策略，又是措施。」這特色顯然是由他求實用、主用世的基本精神而來[132]。孫教授說：呂坤不祇注重實用、

[132] 孫廣德，〈呂坤的政治思想〉，《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69，民 83.9，頁 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行與效果，也頗富實利精神[133]。

顏元與李塨、王船山、唐甄都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顏元與李塨都是實利思想的倡導者，而且其言論「較明確而有系統」[134]。他們二人以外，黃宗羲、顧炎武等，也有趨重實利的傾向，唐甄亦然，但性質不同。

唐甄較強調理論與實際之間的連結，多少能符合實用或實利的原則。孫教授指出：唐氏能重農並不稀奇，因爲這是中國傳統思想主脈，但他能明白表示不輕商，則堪稱獨特。此外，「唐氏於論及各種政治問題之時，不僅揭示理想，且多能提出具體的策略與方法，如對人才的選拔與任用，官吏的裁減與待遇的提高，黨人的懲治，官制與幣制的改革，帶兵之道，用兵之法等，所提出的策略或方法，大都非常具體，非徒高論空談者可比。」[135] 這一點也使唐甄在政治思想史上有獨特的地位。

總結二十世紀下半，以孫先生爲範式的研究成果，以統治的主體與客體、統治的原理爲主軸，輔以對統治組織、統治方法以及統治手段的論述，孫廣德教授建構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精神，而其內涵，依我個人淺見，至少包括道德、倫理、義務、民本以及權力五個大項。從這五個項目，以及先秦儒、道、法、陰陽、與墨家五大學派，推而及於秦以後，綿延至清末，上溯至西周，前後三千年的各宗派，形成一個內容複雜，變化多樣，但原理簡單、脈絡清晰的龐大政治思想世界。這個世界，獨立於西方的政治思想之外，爲期兩千五百年以上，直到明末。

---

133 孫廣德，〈顏元與李塨之實利思想〉，《社會科學論叢》，輯 27，民 67.11，頁 42。

134 孫廣德，〈顏元與李塨之實利思想〉，頁 43。

135 孫廣德，〈唐甄的政治思想（上，下）〉，《食貨月刊》，卷 16 期 1、2，民 75.9，頁 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孫教授治學的重點，就在通觀這段時間的政治思想特質，而歸結到民本思想以及（道）德重於（權）力的兩大主軸上面。在道德與權力之間，傳統中國政治思想的重點在德。孫教授除了肯定這一點之外，更推而及於民本。他認爲：民本與德治，可說是中國政治思想兩千多年來的最大特色。孫教授分從統治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三層互補與交流的合作關係，而非西方的兩層矛盾對立的辯證關係，也就是君爲主角、臣次之、民再次三者之間的互動，來詮釋先秦以來政治思想家，以及少數政治家（如張居正）的政治思想。

除了這兩大主軸，另外還有一些特色，而爲西方所無。那就是：「統治的原理原則爲何？」例如陰陽五行、無爲而治，就是非常重要的兩大項。除上開兩大主軸與另外兩大特色之外，對於階級、神話、賢人等，均有所介紹與申論。加上不強調西人所最重視的 right（權利），而重視自己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也就是強調義務觀念。這正是中國思想家傳統政治論述的主對象並非人民，也非君王，而是「臣」，經過甄拔產生的行政與技術官僚，故而形成行政中立的精英主義：要求士大夫自我期許，從獨善其身出發，到治國平天下的以民爲目的，以民爲本根，但不主張由人民作主的思想。

根據這一政治思想特質，孫教授進一步關懷近代以來的變化。其中自以兩大路線之爭爲核心：一則主張向西人學習；一則繼續肯定自身傳統。在二者之間，也就是傳統與西化之間，更精確地說：民本與民主之間，產生了高度的爭議。孫教授用專書及文章直接敘述思想的爭議，也用文章多次介紹與討論言行的爭議。前者如《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136]、〈龔自珍的政治思想〉、〈龔自珍的經世思想〉。後者如〈北洋主政時期民主思想的反動維護與闡揚〉[137] 與〈倭仁的政

[136] 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 71.5，頁 219。
[137] 孫廣德，〈北洋主政時期民主思想的反動維護與闡揚（下）〉，（臺大）《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思想〉等。透過這些論述，孫教授指出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以民主爲新範圍與新議題的新時代趨勢的內涵。

就在二十世紀結束的時候，孫教授集結其對中國兩千年，特別是近現代的政治思想研究的成果，而有《中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集》、《明清政治思想論集》、《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論集》三部學術專書付梓[138]。第四部合輯《閒思集》是孫教授五十多年來六十多篇詩集、小品、散文、社論、短評等，以及專論政治的文章 5 篇、專論教育的 9 篇、專論哲學的 12 篇合組而成。（這四部均在桂冠圖書公司出版，[139] 如今已絕版。）

《閒思集》這 60 篇左右的合輯，係孫教授將近一甲子時間心路歷程的紀錄。細讀這份紀錄之餘，讀者將發現：孫教授不祇思路清晰、論述明白，而且六十年來首尾一貫，並日趨深刻。特別是其於民國八十一（1992）年在獲頒臺灣大學法學院「連震東講座」的第二屆法政講座的演說〈民主的神話〉一文，更爲傳世之作。

孫教授「民本爲基礎，民主是神話。」的警世名言，在中華民國會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齊在二十一世紀壯大發展的歲月裏，勢必更受重視，而爲具有「中國特色」，足以作爲世紀性典範的基石。當然也是他作爲在臺中華民國，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第三代之範式的具體明證。

捌、孫教授所培養第四代學者

孫教授於研究之餘，也栽培了許多後繼者。他所指導的碩、博士

治科學論叢》，期 8，民 86.6，頁 1-20。

[138] 朱浤源曾作 3 篇書評，同時在《南大語言文化學報》第四卷第二期刊登。

[139] 孫廣德，《閒思集》，臺北縣新店市：桂冠圖書，民 91，初版，頁 2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生人次，目前所知，至少有 40 位。他們是在臺中華民國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第四代的一部分，已分別從四十年前到十五年前畢業，並且多數在中華民國、南韓與日本的學界、政界、輿論界與商界服務。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對在東亞地區的中國政治思想研究，發揮了或大或小的影響力。茲依畢業年次，簡介其論文主題，作爲本文的結束，以及未來跨國協同一致，繼續研究這個領域，以超越前人的開端：

孫廣德教授指導碩博士學生名單

臺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畢業學年	姓　　名	題　　目	指導教授
59	黃碧端	王安石政治思想之研究	孫廣德
60	唐秀美	張居正的政治思想與策略研究	孫廣德
62	盧瑞鍾	先秦天道觀念之研究	孫廣德
65	孫順智	韓非實利思想之研究	孫廣德
65	陳孟忠	馮桂芬維新思想之研究	孫廣德
66	廖芝良	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	孫廣德
68	李在光*	王韜維新思想之研究	孫廣德
69	劉吉原	張之洞中體西用思想之研究	孫廣德
69	黃圭學*	嚴復變法思想之研究	孫廣德
71	葉仁昌	何啓、胡禮恒的維新思想	孫廣德
72	翁志宗	甲午戰前萬國公報維新思想之研究（1868～1894）	孫廣德
73	柯義龍	王船山的民族思想之研究	孫廣德
74	屠乃瑋	孔子「理想國」之研究	孫廣德
74	趙廣洙*	劉師培的無政府思想	孫廣德
76	鄭貴和*	荀子的禮治思想	孫廣德
79	安雲煥	康有爲的大同思想	孫廣德
79	羅志源	龔自珍的政治思想	孫廣德
79	郭應哲	莊子明王之政治思想	孫廣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畢業學年	姓　　名	題　　目	指導教授
80	林俊宏	莊子的政治觀 — 一個思想典範的詮釋	孫廣德
81	左藤將之〇	孟子政治思想之研究	孫廣德
81	詹　康	明代的教化思想	孫廣德
84	王憶萱	李贄的政治哲學	孫廣德

說明：韓籍畢業生以「＊」號，日籍畢業生以「〇」號表示。以下同。

臺大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畢業學年	姓　　名	題　　目	指導教授
72	朱浤源	民報的革命理論	連　戰 孫廣德 許介鱗
72	盧瑞鍾	太平天國的神權思想	孫廣德 賀凌虛
75	邱榮舉	孫中山憲政思想之研究 — 析論其對中央政制之設計	孫廣德 賀凌虛 林紀東
75	李在光＊	戴傳賢（季陶）的政治思想	孫廣德
77	趙倫秀＊	先秦儒家尚賢思想之研究	繆全吉 孫廣德
78	葉仁昌	民九至民十七反教與護教言論中之政治課題	孫廣德
80	鄭貴和＊	胡適的自由思想	孫廣德
82	趙廣洙＊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中君主角色之研究	孫廣德
84	郭應哲	戰國至漢初黃老學說的政治思想	孫廣德
84	林俊宏	魏晉道家政治思想之演變	孫廣德
84	金珍能＊	五四時期研究系的政治主張	孫廣德 盧瑞鍾

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班（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畢業學年	姓　　名	題　　目	指導教授
74	陳文章	中山先生與先秦儒法之君臣思想比較	孫廣德
76	趙素娟	新青年雜誌的言論主張：一個思想史的考察	孫廣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畢業學年	姓　　名	題　　目	指導教授
69	賴慶鴻	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	王兆荃 孫廣德
78	郭立民	淮南子政治思想之研究	楊樹藩 孫廣德
84	潘台雄	康有爲和梁啓超的君主立憲思想（1898～1911）	孫廣德 張治安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班

畢業學年	姓　　名	題　　目	指導教授
72	蕭子仲	墨家組織與管理思想之研究	孫廣德

玖、結語

包含兩岸在內的大中華世界，其三、四千年以來政治思想的特色爲何？六十年來成爲引進西方科技文明、推動基督教民主順利，以及人文薈萃之地的臺灣，曾有許多學者做過無數的探討。本文就成千上萬相關學者之中，依時序分爲四個世代，在前三個世代中，挑出數十位，代表那個世代的特色。再以其研究與創作足以涵蓋這六十多年的學者孫廣德先生，作爲臺灣地區研究代表中的代表。孫教授專研中國政治思想史一甲子以上，對中國政治思想變遷的觀察，有許多超越前人的發現與論述。

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處在大革命之下的中國，特別是西化與基督教化最深的臺灣，其人民似乎不再以民本思想爲主軸，而改採民主。但是，六十年來縱看中國歷代的文獻與史乘十餘次，與橫剖各代人物數十回的孫教授看法不同。在其所評析與介紹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兩三千年的的大傳統裡，吾人見不到中國菁英肯定民主政治。因此，他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介紹民主，並肯定民主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存在與必然，但是，他也客觀地告訴世人：中國在秦以前，並無皇帝專制，而且思想自由，並於 2132 秦至清的年中，強調統治需以民爲本。他更在在民國八十一年發乎讜論，提醒學者們：「民主」也是「政治神話（political myth）」的一種。易言之，相信芸芸眾生可以做出國家的最高決策，只是一種信仰，而不必然是社會的真。社會的真告訴我們：統治永遠是少數人的事，民本才是根本；爲數不多的官僚群，也就是古代所謂的「臣」，才是統治或治理的主力部隊；「君」（元首）與「民」均次之。而且，統治的方法在德而不在力。

如今二十世紀已經進入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中國，曾經在近代的三百年，因爲科技文明落後，而「淪」爲科技文明發達之國的「次殖民地」。經過從洪秀全基督神權武裝革命、孫中山西式武裝共和革命、蔣中正西式國民革命、毛澤東將中國文化大摧毀，前後一百三十年的四大革命洗禮之後，再經過三十餘年的今天，在科技方面即將迎頭趕上，與經濟發展方面更快速進步與強大的中國（包含「海洋中華」的中華民國與「陸地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則其於二十一世紀的重新崛起於寰宇，指日可待。

強大的中國，特別是四百年以來社會開放，科技文明發達，並兼融東西文化的「海洋中華」的中華民國的臺灣地區，勢將成爲樣版，以檢視兩岸的政治經驗，其中自然包含思想在內。

在這個節骨眼上，孫教授爲中國政治思想史所開啓的新頁，將由其傳人，會同大批第四代，甚至第五代、第六代……的有識之士，以這個海洋中華核心的臺灣地區爲出發點，從更深的層次，進一步檢討：「中國一百六十年以來，曾因基督宗教衝撞，所培養的西式民主，特質在重法與重力者，其成效爲何？」俾憑以策勵將來，探尋：「西式民主是否足以化入儒、道、佛爲主幹，更重德治的華人社會？」的答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孫廣德教授代表性著作目錄

一、專書

《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民國 60 年 5 月；民國 63 年，再版，頁 23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242。

《晉南北朝隋唐俗佛道爭論中之政治課題》，臺北市：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61 年 5 月，頁 197。

《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1 年 5 月，頁 219。

《政治神話論》，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9 年 9 月，頁 297。

《先秦兩漢陰陽五行說的政治思想》，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82 年 6 月，頁 320。

《中國政治思想史》，與朱浤源合著，臺北縣蘆洲市：國立空中大學，民國 86 年 1 月，頁 426。

《中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集》，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民國 88 年 5 月，頁 567。

《明清政治思想論集（上，下）》，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民國 88 年 5 月，上冊頁 528、下冊頁 480。

《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論集》，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民國 88 年 5 月，頁 281。

《閒思集》，臺北縣新店市：桂冠圖書，民國 91 年，頁 2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期刊論文

〈五德終始與朝代更替〉，《中山學術文化集刊》，集 2，民國 57 年 11 月，頁 141-181。

〈呂坤的政治思想〉，《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 2 期 7，民國 59 年 7 月，頁 21-24。

〈墨子及其著作〉，《中央月刊》，卷 5 期 6，民國 62 年 4 月，頁 137-145。

〈春秋時代上層社會的天道觀〉，《東亞季刊》，卷 5 期 3，民國 63 年 1 月，頁 13-27。

〈孔孟荀的天道觀〉，《孔孟月刊》，卷 13 期 7，民國 64 年 3 月，頁 11-16。

〈我國古代政權轉移理論之研究〉，（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24，民國 65 年 3 月，頁 289-317。

〈陰陽五行說與漢代政治（單行本）〉，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民國 66 年 2 月，頁 1-27。

〈顏元與李塨之實利思想〉，（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27，民國 67 年 11 月，頁 41-73。

〈王船山的民族思想〉，《政治學論叢（論文集）》，聯經文化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68 年 1 月，頁 37-93。

〈戊戌前後的民權思想（1894-1903）〉，《變法與立憲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0 年 8 月，頁 8-33。

〈柏拉圖與先秦儒家賢人政治及階級觀念比較〉，《中國國學》，期 9，民國 70 年 9 月，頁 56-62。

〈我國正史中的政治神話〉，（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30，民國 71 年 9 月，頁 29-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倭仁的政治思想〉，《政治學報》，期 10，民國 71 年 12 月，頁 135-205。

〈龔自珍的經世思想〉，《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3 年 4 月，頁 275-294。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爭議之檢討〉，《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冊 3，民國 73 年 5 月，頁 451-475。

〈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32，民國 73 年 12 月，頁 173-223。

〈龔自珍的政治思想〉，《政治學報》，期 12，民國 73 年 12 月，頁 191-291。

〈唐甄的政治思想（上，下）〉，《食貨月刊》，卷 15 期 11、12，民國 75 年 6 月，頁 30-54；卷 16 期 1、2，民國 75 年 9 月，頁 67-91。

〈我國古代政治思想中之義務觀念〉，《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卷 19 期 1，民國 75 年 6 月，頁 119-133。

〈我國傳統思想中成就定位與成就觀念的檢討〉，（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35，民國 76 年 3 月，頁 9-24。

〈我國民本思想的內容與檢討〉，（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36，民國 77 年 3 月，頁 401-438。

〈我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天道觀〉，《中國國學》，期 16，民國 77 年 10 月，頁 91-126。

〈先秦儒法道三家的無爲而治思想〉，《第一屆中國思想史研討會論文集》，東海大學文學院，民國 78 年 6 月，頁 1-18。

〈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之德與力〉，《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64，民國 81 年 3 月，頁 189-208。

〈劉基的政治思想〉，（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40，民國 81 年 6 月，頁 1-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船山思想中的君主角色〉，《哲學與文化月刊》，卷 20 期 9，民國 82 年 9 月，頁 848-859。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67，民國 82 年 10 月，頁 17-69。

〈呂坤的政治思想〉，《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69，民國 83 年 9 月，頁 1-49。

〈薛瑄的政治思想〉，（臺大）《社會科學論叢》，輯 42，民國 83 年 12 月，頁 47-100。

〈張居正的政治思想〉，《政治學報》，期 23，民國 83 年 12 月，頁 1-80。

〈清末憲政運動時期民主政治的提倡與設計〉，《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71（下冊），民國 84 年 10 月，頁 1-34。

〈丘濬的政治思想〉，《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73（下冊），民國 85 年 10 月，頁 69-110。

〈北洋主政時期民主思想的反動、維護與闡揚（上）〉，（臺大）《政治科學論叢》，期 7，民國 85 年 6 月，頁 1-38。

〈北洋主政時期民主思想的反動、維護與闡揚（下）〉，（臺大）《政治科學論叢》，期 8，民國 86 年 6 月，頁 1-20。

三、學術研討會論文

〈墨家政治思想中之唯物傾向與唯心傾向〉，韓國中國學會第七次國際中國學大會論文，約六千字，民國 76 年 8 月。

〈先秦儒家的人性論〉，香港大學儒學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約一萬四千字，民國 76 年 12 月。

四、書評

〈評邵德門著「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國史館編印，《中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代史書評選輯㈤》，民國 79 年 4 月，頁 1-17。
〈評李澤厚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國史館編印，《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㈦》，民國 80 年 6 月，頁 13-36。
〈評吳廷嘉著「戊戌思潮縱橫論」〉，國史館編印，《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㈧》，民國 81 年 6 月，頁 17-35。
〈評張錫勤著「中國近代思想史」〉，國史館編印，《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㈨》，民國 81 年 12 月，頁 1-28。
〈評李龍牧著《五四時期思想史論》〉，國史館編印，《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㈩》，民國 82 年 12 月，頁 311-3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Studies in Taiwan (1945-2008):

The Four Generations and Their Pattern—Professor Sun, Kuang-De

Hong-Yuan Chu

Abstract

Taiwan, as a part of the Chinese land in the recorded history, was open to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Great Navigation Period from 4 centuries ago under the name of Formosa.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as well as the Indian Buddhism, and Chinese Confucianism & Taoism did play important roles influencing Chinese thinkers in the past. They all together had formed many rich and special styles that made the studies of them a tough job.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scholars, however, devoted their energies discovering the nature of them in Taiwan since her restoration to China 1945 to 2008. That four generations can be told was discover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rticle in which a special background of Christian Western democracy in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thought was acknowledged and placed in mind for evaluation.

The article discovered that from the last four generations of the studies, an overwhelming trend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dem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undamentalism (民本)' has its deep and common roots in the mind of the three thousand years thinkers. And Professor Sun Kwang-De was patterned to represent and describe in depth the fact of this difference from the Western thinkers who all conclude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demo-cracy (民主)'. Professor Sun Kwang-De was aware of it and made his most important speech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long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emocracy is nothing but also a kind of political myth. This article tells the details of his reasons, as well a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four generations in Taiwan.

Keywords: Professor Sun, Kwang-D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emo-fundamentalism, demo-cracy, Western Christianity, Taiwan, myth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